



“大家小书”系列部分作者近照

## “大家小书”系列丛书出版—— 用小书与大家对话



一是指其篇幅小，二是指姿态低。但就其分量而言，非但不小，反而相当重。出版方解释，小书之所以不小，是因为这些书均为各个领域的经典之作，“大家小书”的各位作者也都是学界泰斗，“他们厚积薄发，热忱地将自己毕生所学、所思深入浅出地奉献给大家”。

“大家小书”自2002年初版以来，历时十五年，迄今已出版百余种经典，涵盖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学、语言学、社会学等多门学科。有的引导文学欣赏，如夏承焘的《唐宋词欣赏》；有的介绍入门路径，如顾颉刚的《中国史学入门》；有的传道授业解惑，如

赵朴初的《佛教常识答问》；有的是学科概述，如姜亮夫的《敦煌学概论》；有的是学科历史扫描，如刘叶秋的《历代笔记概述》；有的贯通科学与人文，如竺可桢的《天道与人文》。

“大家小书”丛书收录了诗词研究家叶嘉莹的《名篇词例选说》一书。谈及对“大家小书”的理解时，叶嘉莹说：“大小之间关系密切，你没有大的根底，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。没有大的修养，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，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，也不会讲到真正的生命的所在。你的知识、学问、修养，一切都有密切的关系。”

“大道至简，真理平凡，要能够至简地把大道理说出来，需要有相当的修养，有文化的修养、专业的修养才能够写出来。”在“大家小书”丛书发布会上，丛书编委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说，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，“很有本事的一点就是化简为繁，大家觉得只有把简单说复杂了才显得有学问，但是真正的有学问体现在至简里面。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瞿林东也认为，相比于大部头著作，经过专业人士遴选的大家小书，对我们今天过分地追求那种“大”，是一个很好的补充，一种调剂，“真正的学问，用小书也是可以表现出来的，甚至有很强的生命力，这对当前我们的文化发展、学术发展，我们的学风应当怎样正确认识，都是很重要的。”

在陈平原看来，大家写小书很不容易，除了在语言上要特别讲究外，还要有自觉跟读者对话的意识。在“大家小书”一百多本书中，陈平原认为有三本书最符

合他对丛书的定位：朱光潜的《谈美书简》、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和季镇淮的《司马迁》。“大专家写小书不容易，放下架子，面对读者，语言还要特别讲究。”

现有的“大家小书”的作者多数都是已故名家或是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，缺乏年轻的学者。对此，陈平原说，现在年纪不太大的还没有退休的大学老师们，由于受整个学术体制的制约，很难全心投入到面向大众普及的“小书”创作中，“写这些小书是不算学术成果的，人家就会说你是不是想挣稿费”。

陈平原为丛书挑的另一个刺是，“大家小书”基本上都是文史类的书籍，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好书。“我特别喜欢竺可桢的《天道与人文》，我们不会读气象学、地理学的书，但是他的书里面有这一类知识。”他也希望，未来的“大家小书”能够有一类面向公众，谈自然科学、谈人生、谈人文的书籍，“不止有文史哲，更有政经法，还有自然科学的大家，他们写的小书。”

## □王昱

最近，偶得一套名为《大家小书》的丛书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据出版者在书中介绍，所谓“大家”，是指学有专长的老一辈学者。也寓意本套丛书是为大众阅读而编辑出版的。所谓“小书”，是指所选著作都是篇幅短小的作品，用32开印刷，便于携带阅读。

用32开的口袋书讲大问题，这个在我国还十分鲜见的体例让我想起了在日本逛书店的那段日子。有一个盛传已久的说法，说日本人每人每年读书40本以上，而自诩有着博大精深文化传统的中国人，平均每人每年阅读量不及日本人的1/10，连十本都不到。可是，如果你真到日本的书店去看看，会发现在这种比较中，日本人其实是要赖的——他们读的大多数书实在太小了，小到跟苹果出的iPhone6 Plus差不多大。日本人用这种小32开本的口袋书几乎能谈任何问题——广大宅男喜闻乐见的工口漫画是这么印的，很多严肃的玩意儿他们也这么印。我在这类小书的书架上曾经看到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写的《致美丽的日本》，几乎是乡下老农拉家常的口气向民众说明他的政治主张，旁边紧挨着一本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半藤一利写的《昭和与日本人失败

中国的学者们喜欢用大部头去研究小问题，一个有志于学的年轻人，即便有才气，也必须从很不起眼的问题研究起，等在圈里混到两鬓斑白爬到象牙塔顶端了，才敢写书谈点大问题。如果你年纪轻轻就试图用小部头写大问题，或者把教授们视为极端复杂的问题谈简单了，则不啻于欺师灭祖。

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我有位学长，因其读书破万卷，宿本能开个小图书馆，我们都很崇拜他，以为他将来必成“大家”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兴冲冲地跑到我寝室来串门，跟我说他开悟了，搞出来一套比布罗代尔（一个法国史学家）还牛的史论，他说等他念到研究生阶段，就要开始着手进行该理论的具体构建。我们当时听了都很为他高兴，等着他出一部刷新中国史学沉沉暮气的巨著。可是等他真念了研究生，却不见搞那套很牛的史论，而是听从师命去做“明清锡箔纸研究”去了。所谓“锡箔纸”者，古人上坟所烧的纸钱也。于是这哥们儿花了三年时间，写了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论文，“浅论”了一番明清两代人所烧纸钱的问题。

中国的学者们喜欢用大部头去研究小问题，一个有志于学的年轻人，即便有才气，也必须从很不起眼的问题研究起，等在圈里混到两鬓斑白爬到象牙塔顶端了，才敢写书谈点大问题。如果你年纪轻轻就试图用小部头写大问题，或者把教授们视为极端复杂的问题谈简单了，则不啻于欺师灭祖。若干年前，有个小公务员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大部头也不算小的明史通俗读物，

名曰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该书火了以后立刻遭到了一群老家伙的口诛笔伐。其实此公遭人恨的地方不仅在于坏了规矩，主要原因是据说他曾说过一句更犯忌的话：“就那点东西（指明史），几年就可以弄明白了，他们说要搞一辈子，要么是傻子，要么是骗子。”

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句想砸一群人饭碗的发言，此公终于没混进学术圈，走马就任某地副县长去了，从此少有著作问世。留下一群学究，继续把学术搞得很不通俗，高深得要研究一辈子。

中国文人为啥这么喜欢把任何问题都搞得神神秘秘，不屑于用三两句话跟凡夫俗子们说清楚？照搬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，我觉得这得从中国古代技术发展上去找原因。我们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为给老祖宗争这项专利，咱还经常要跟旁边的韩国邻居撕一下。其实，这种争执在欧洲人看来估计很无聊，在西方人的概念中，真正改变世界史进程的活字印刷术是15世纪由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，该技术普及之后西方书籍立刻变得很便宜，普通市民能够买得起，于是老百姓买书看成为了一项现实需求。至于咱们中国，虽然自吹在宋代就有了活字印刷，但一直到明清时期，主要书籍依然是用雕版印的，明嘉靖

时期，一本正版书的价格按购买力折算，放到今天少说也得1300元左右。这个价格让普通民众压根不可能买得起，书籍一直是士大夫们圈里自娱自乐的工具，当然没有必要写得简单通俗。反观那年头的欧洲，书价降低所导致的受众变化已经影响了写作者自身的思维方式，The Enlightenment这个字眼翻译成“启蒙时代”是否准确暂且不说，至少“启蒙”这个字眼确实用得很传神。那个年代的欧洲“大家”们，确实在用最通俗的笔调向人类宣讲着启蒙知识，而他的听众，不再仅仅是国王和贵族，更有普通民众。

信笔写了这么多，突然觉得有点写跑题了，手上的这套《大家小书》虽然规格上很让人眼前一亮，但内容依然还是中国式的。书中的“大家”们所关心的依然是琴棋书画、诗词戏曲之类文人气息浓厚的小问题。在中国，想真正出一本像托马斯·潘恩的《常识》那样真正的“大家小书”，恐怕还要等很久吧。我们的学者们，对着帝王将相和他们自己宣讲了太久，想让他们换个姿势写作，那是很难的。